“比较文学文献学”何谓与何为
——基于中日文学关系研究实践的理论对话

张哲俊　　王升远

[摘　要]　比较文学文献学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也是新方法，迄今尚未发现以往的研究中存在比较文学文献学的名称与方法。比较文学文献学是以阅读书目校注与研究文学交流关系的方法，引进了阅读书目，阅读书目包含了交流信息，既可以解释语词的意义，又同时可以提供交流关系。比较文学文献学的任务是校注与还原交流关系，源流关系与交流关系的差异来自典据与典源，源流关系的研究重点是调查先后文献的传承与变异，但交流关系的研究重点是调查交流对象或交流对象的范围。

[关键词]　比较文学文献学　交流关系　源流关系　线性关系　网状关系

策划与整理： 王升远
受　访　人： 张哲俊

王升远（《日语学习与研究》编辑部）：

张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日语学习与研究》杂志的专访。今天想围绕近年来您提出的“比较文学文献学”为中心展开讨论。想先请教一下，您走向“比较文学文献学”的契机是什么，前期有着怎样的学术积累或者研究案例支撑和推动呢？

张哲俊（四川大学）：

首先，非常感谢你读了我新近发表的几篇比较文学文献学的论文[1]，并且约我对谈“比较文学文献学”，这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文献学或语文学是小众的学问，不大容易受到关注。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对我说，你弄的“比较文学文献学”是不会引起关注的。近来有几个学术会议，也邀我来谈比较文学文献学，“东亚视界”公众号上还连续推送我的两篇相关文章，这都超出了我的学术预期，我深感欣慰。

我现在研究“比较文学文献学”，似乎有些追赶时髦的意思。其实，这并不是追逐热闹。从2005年开始，我就以注释、校勘的方式写论文，也写专著。《杨柳的形象：中日物质的交流与日本古代文学》《韩国坛君神话研究》《韩国上古诗歌研究》等都是以这种方法写成的，书中的章节其实都是一条注释或校勘，其结果必然进入到了一般的校勘、注释没有到达的深度，同时又与一般的论文也有了一定的差异。这样既接近了文献学，也没有放弃比较文学的研究，第一次尝试了将文献学与比较文学结合起来的方法。一直按照这种方式研究下去亦无不可，但可以想到的是只能看到类似的风景，至多是换了一些题目而已。这样研究了十年之后，2015年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项目“日本五山文学别集的校注与研究”，最初的想法是放弃以校勘、注释写论文、著作的方式，而是用论文方式校勘、注释五山文学的别集，这就等于反过来使用已经使用十年的

方法，看看能够出现什么东西。毕竟以校勘、注释的方式写论文、著作，与以论文方式校勘、注释是不同的方法，这是以另一方式结合文献学与比较文学。

于是我选择校注五山诗人瑞溪周凤的《卧云藁》，最初设想要以阅读书目校注，这样能够更准确地解释语词的意义，也能够研究中日文学的交流关系。为此我专门调查了瑞溪周凤的阅读书目清单，那时查到的书目只有300多种。可是真正开始校注时犹豫不决，十分焦虑，主要是不能确定能否以阅读书目来校注，无论是东亚还是西方，校注的历史相当悠久，但我没有看到过以阅读书目校注的成果，我周围的学者也从未看到过此类成果。我自然也深疑这种可能性，只好还是采用常规的校注方法。这样比较稳妥，至少没有风险。校注《卧云藁》是我主持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有时间限制，也有发表阶段性成果的要求，不能任意而为。现实总是存在各种限制，不能让你自由地研究，这是最大的悲哀。校注了数十首诗歌之后，很快遇到了不可解决的问题，就是同一语词的用例有时较多，不知应当选用哪一用例。古典文献学以解释语词意义为主，最好使用典源文献。但没有找到典源文献，就马上会陷入困境：在很多用例中不知道应当选择使用哪一用例，无论选用哪一条，或者弃用哪一条，都不能拿出像样的理由，只能是率性而为。古典文献学没有提供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案，没有选用文献用例的惯例或规则。从前人的校注中也看不出什么名堂，有的校注本没有使用文献用例，有的校注本使用了文献用例，使用多少用例也都自由，一般是一、两例，或者三、四例。古典文献学的校注主要是解释语词意义，语词意义尽管会有变化，但相对有一定的稳定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变化，有的语词从古至今都没有变化，这样可以选用的文献用例范围就相当宽泛，自然就相当自由，但也带来了选择的难题。

这一难题让我焦虑不堪，只好回到最初的想法，以阅读书目校勘与注释，这样可以解决择用文献用例的难题，也能够解决研究交流关系的问题。阅读书目有一个用例，就使用一个，有多个用例，就使用多个，这样也就轻松解决了选择的难题。解决了择用文献用例的难题，又遇到了新的问题：阅读书目有时只有一个用例，有时则多一些，这又表明什么呢？包含了怎样的交流信息呢？由于没有先行研究，也就不可能在先行研究中找到答案。因此又备受折磨，痛苦不堪，有时又想退回到常规的校注方法。这是一个不断解决问题、又不断出现新问题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调试的过程。但至少以阅读书目校注还不至于无法校注下去，因为绝大部分校注的语词，都能够找到阅读书目的用例，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用例，就用一个用例，有多个用例，就用多个用例。总体来说，决定以阅读书目校注之后，整个过程还是比较顺畅的。但仍然不明白阅读书目用例的不同分布意味着什么，阅读书目可以提供交流信息，这一点十分重要，但只是一味地校注，恐怕无法解答我心中的疑问。因此我感觉到在校注《卧云藁》时，还需要写一本《比较文学文献学》。因为只有个案实践，无法更深思考，也想不出更多如此校注的理由和价值，撰写《比较文学文献学》，就可以反思能够如此校注的原因，解决我心中的问题。这样在校注《卧云藁》与《比较文学文献学》之间，不断来回调整修改，思路也变得越来越清晰。校注《卧云藁》是个案实践，《比较文学文献学》是研究方法问题，此外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因此最好还是再写《卧云藁》的文献学研究的一本书，这样校注才能更为深入。以阅读书目校注，对我而言是最初的原始试验，也就会触摸到原始问题。看不到前人的试验结果，就只能触摸着前行，这一过程相当煎熬。

王升远（《日语学习与研究》编辑部）：

事实上，“文献学”研究在中外学界都各有其源流，且历史悠久；“比较文学”也早已是显学，从业者甚多。

那么，到底什么是“比较文学文献学”，在“比较文学”和“文献学”的基础上，它提供了怎样不同的学术视野的观念、方法上的新意，它有着怎样不同的内涵和外延？

张哲俊（四川大学）：

近些年来文献学或语文学、古典学已经成为了学界的话题，似乎此类领域已经不再是小众学问，大有已经成为流行问题的迹象，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或若干学校创建了古典学的研究机构。从话题层面来说，已经进入了学术公众的视野。

那么什么是比较文学文献学？其实从上面的讨论中已经可以得到基本的概念：比较文学文献学是以诗人的阅读书目校勘、注释与研究交流关系的方法，其中包括了以调查阅读书目为中心的目录学，也包括了以阅读书目校勘与研究交流关系的校勘学，还有以阅读书目注释与研究交流关系的注释学。古典文献学还包括了其他领域，但我所做的比较文学文献学是由目录学、校勘学、注释学构成的。这就是说比较文学文献学一方面要完成文献学校勘、注释的一般任务，同时还要完成还原交流关系的任务。目录学是古典文献学的核心领域，但主要研究的是目录与版本之类的问题，完全不涉及阅读书目的问题，古典目录学与比较文学目录学完全不同。古典校勘学也是核心领域，主要是从事版本校勘，比较文学文献学也从事版本校勘，但还要用阅读书目校勘，阅读书目的用例能够显示诗歌文本语词来源的信息，因而能够补充版本校勘的不足，也可以为版本校勘提供依据。校勘可以是综合校勘，可以采用综合各种方法校勘，但未见古典校勘学运用阅读书目校勘的论述。在古典文献学中注释学几乎是可有可无的，大部分文献学著作根本就不会提及注释学。但在比较文学文献学中注释学十分重要，其地位不亚于目录学、校勘学，因为大部分交流关系是通过注释来研究还原的，没有注释学，就无法完成还原交流关系的任务。

与比较文学文献学相关的领域还有古典学，古典学是更大的概念，可以包括文献学与比较文学文献学，古代思想、政治、历史、文学等等，都属于古典学。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核心领域应当是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等，英国文献学者A•E•豪斯曼以为：“有人说校勘是学问的皇冠与顶峰，这并没有证据，也不一定是对的；但是校勘家所需要的品质是十分珍稀的，无论校勘家能否因此而出众。”[2]不管校勘是学问的皇冠或顶峰的说法对不对，至少可以说明校勘学或文献学是核心领域，但在这些方面并没有看到新的推进。这不只是中国文献学的问题，其实也是国外文献学的问题。这就等于核心领域之外出现了很多成果，但最难的核心部分没有发展，甚至不大有人触碰。我想很多人都是聪明人，核心部分即使付出太多的努力，也难以出现新的看法，在以数量比拼高下的时代，实在不是“多快好省”的办法。然而核心部分没有突破，也就难以真正的推进，文献学、语文学的热闹是存在的，但热闹的是外围，内部核心之处几乎看不到有什么动作。

比较文学自产生以来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但一直没有“比较文学文献学”，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学者较少校注作品，多是参看外国学者的校注，或者是中国古典学者的校注，这样就缺少校注经验。而文献学是实践性学科，没有校注实践，就难以产生“比较文学文献学”。最近也有学者提出建构“外国文学文献学”，但从构想到真正出现“外国文学文献学”，落实起来还有遥远的距离。比较文学学者基本是以论著作为研究的基本方式，偶尔做了校注，基本是采用古典文献学的方法。古典文献学的校注方法能够满足校注文本的一般需求，可以校正讹误，解释语词。“比较文学文献学”终究也是文献学，也要校勘讹误、解释语词，但还要注出交流关系，交流关系是“比较文学文献学”的双重任务之一。这样“比较文学文献学”与古典文献学就有了不小的差异，古典文献学能够满足一般的校注需要，但未必能够满足研究交流关系的任务，这样就不能移用古典文献学的方法，必须建构一种能够满足比较文学需要的

校注方法。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很少研究中国文学，主要是研究外国文学或搞中外比较，这似乎已成为了惯例。形成这种惯例的原因在于国内高校的专业设置上，外文系的学者是以外国文学为主，中文系的学者也是以外国文学为主，中文系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设立在一起，这一专业实际上属于世界文学专业，结果无论是中文系还是外文系，都以外国文学为主，中国文学是缺席的。但比较文学研究的实际状况是，中国文学几乎是不可缺少的主角之一，这样，专业设置与学术研究彼此脱节，中国文学只是作为比较研究附带的研究对象，从未成为真正的研究对象。当然，并不是说没有将中国文学作为真正研究对象的比较文学学者，只是此类学者较为少见。如果中国文学没有成为专门的研究对象，那么，对其研究的深度就会出现欠缺，于是便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前人研究。不过，研究文学关系遇到的问题，未必与中国文学的以往的研究相合，或者以往的研究没有研究过，这样只有专门研究中国文学，才能研究文学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专门研究中国文学并未超出比较文学的正常范围。中国的比较文学应当是以中国文学为基础的比较文学，中国文学不应当是附属研究对象。西方的比较文学常设在英文系，日韩学界亦有不少日本文学、韩国文学的比较研究，中西进是日本代表性的比较文学学者，他的代表作是《万叶集与中国文化》。此类题目在韩国很常见，但在中国很少见，这与中国的专业设置不无关系。这种状况不利于产生“比较文学文献学”，对中国文学没有深入、细致的了解，很难从事校注工作。当然仅仅熟悉中国文学是不够的，还需要比较文学的问题意识，按照比较文学的需要校注，才有可能产生“比较文学文献学”。实际上，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应当既能独立研究外国文学，也能够独立研究中国文学，是外国文学的专家，也应当是中国文学的专家，这是十分困难的，但不是做不到。比较文学从来都是比中国文学更难的专业，但是在比较文学中可以看到在外国文学或中国文学中看不到的风景，既能解决中国文学的问题，也能解决外国文学的问题，还能解决中外文学关系的问题。

王升远（《日语学习与研究》编辑部）：

“比较文学文献学”的说法确实此前从未见国内学者提过，国际学界似乎也未见此说。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一些学者做的研究或许已经是您提出的“比较文学文献学”范畴内的工作，只是或许并不以此名之。那么，如此说来，您如何确认“比较文学文献学”有着实际意义上真实的理论新意？与中西古典文献学究竟有何不同，它有什么与之不同的方法？

张哲俊（四川大学）：

我查了西方主要国家的图书馆，竟然发现西方主要国家连“比较文学文献学”的表述都没有，英文里没有Comparative Literature Philology的表述，其他主要语种的书目文献，我无法调查，请我的朋友帮忙调查，结果是一样的。日文、韩文也是如此。东京大学教授芳贺矢一（1867-1927）是近代日本文献学的开拓者。他早年留学德国，学习了德国的语文学，回国后撰写了《日本文献学》，此书梳理了德国语文学的产生与发展，并将德文的Philoloie（即Philology)译为文献学[3]，而不是译为语文学，这样在东亚主要是使用文献学的用语，但近年来学术界也常用语文学的用语。中国虽有悠久的文献学历史，但没有提出过文献学的概念，这是梁启超等人从日本引进的。其实有无“比较文学文献学”的表述，也许没有那么重要，没有这一概念，并不等于没有比较文学文献学之实。我的一个朋友说，法国有比较文学文献学，梵•第根的弟子就以阅读书目校注与研

究了交流关系，只是没有用这一表述。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信息，毕竟法国学派重视实证研究。于是我请教了长年在法国阿尔图瓦大学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金丝燕教授，她说法国人不做这样的学问，也就没有这样的成果。一次，我在浙江工商大学举办的学术会议上发表了校勘坛君神话的论文，单是校勘“坛”一个字，就写了五万字。当时，来自美国的华裔学者认为，这样的研究毫无价值，在美国学界完全没有市场，最多是在注文里提及而已。语文学在美国的学界的确没有多大的市场，近年来美国大学的古典学系也难以招到学生。但还是有一些学者从事语文学的研究，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保罗•德曼等人呼吁回到语文学，语文学家也时常修正学界出现的各种失误，但语文学早已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不过总体来说语文学或文献学最为发达的还是中国与西方，日本学者十分重视文献学的研究，但几乎都是个案的文献学研究，研究文献学方法与规则的论著却极为罕见。日本学者翻译了倪其心以及其他人的文献学著作，他们向来一般只关注个案研究，出现这种状况并不意外，韩国的状况也基本类似。中国的文献学著作还是相当丰富的，但主要内容大同小异。其实大同小异的不只是中国的文献学著作，西方的状况也基本类似。胡适曾经感叹：“中西校勘学的殊途同归的研究方法，颇使我惊异。”[4]产生这种现象是因为文献学是实践性学科，中西文献学遭遇的问题相同，可展开思辨或发挥的空间相当有限，也就难免大同小异。

我现在第一次使用了比较文学文献学的概念，这固然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如果前人早已做过类似比较文学文献学的工作，那么我所做的研究价值将大打折扣，但迄今为止尚未发现类似的研究成果。古典文献学是一切人文学科研究的基础，对文学研究来说也是如此，在讹误百出的文本基础上展开研究，很难得到正确的结论。既然如此，比较文学也应当与其他人文学科那样，以其为共同的学术基础。“比较文学文献学”应是古典文献学的分支学科，就像现今存在不少文学文献学、戏曲文献学、小说文献学等等一样。但“比较文学文献学”与此类分支文献学不同，后者往往没有方法的建设，主要是介绍与研究不同领域的重要书目文献。“比较文学文献学”的重点是方法的建设，文学的交流关系存在特殊的问题，古典文献学几乎没有论及比较文学交流关系与校勘、注释的关系问题，因而“比较文学文献学”无法与其他人文学科那样仅以古典文献学为基础，不能只是记述重要书目的版本、流传等等。比较文学需要的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比较文学文献学”，这样才能真正推进交流关系的研究，当然建构这种意义上的“比较文学文献学”难度更大一些。这一难度产生于建构方法本身，也产生于研究现状，毕竟这不是学界熟悉的内容。人文学科的研究一般是根据已知的知识，去探索与理解新近出现的研究，如果内容过于陌生，超出了一般知识的范围，就很难理解。由此带来的困难不小，这也是我极度焦虑的原因。

比较文学文献学看起来也许仍然是大同小异，但实际上与中西文献学很不相同。以校注方式研究交流关系是“比较文学文献学”的基本方法，但这似乎不是什么新的方法，在日本古典文学、韩国古典文学的校注中，时而可以看到校注文学关系的案例。如此看来，就像你前面所说的那样，前人早已做了相同的工作，只是没有使用比较文学文献学的用语而已。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意味着古典文献学早已包含了比较文学文献学，东亚学者都是按照古典文献学的方法校注的。不过“比较文学文献学”的校注方法同古典文献学存在本质的差异，比较文学文献学是以阅读书目校注，古典文献学是以一般书目校注，这一差异表面看来只是以阅读书目替代了一般书目，两者都可以用于校注，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变化，未必能够走出古典文献学的范围，但实际上这是天壤之别。以一般书目校注，既可以解释语词的意义，也可以注出文学关系，但注出的文学关系不是交流关系，而是源流关系。一般书目没有包含交流信息，只是包含了语词相关事物、内容的信息，不能注出交流关系。按照时间顺序罗列语词相关事物的书目文献，可以看到前后书目文献内容的传承

与差异，这就是源流关系。源流关系跨越国界，就是比较文学的源流关系。以往比较文学研究所说的交流关系，实际是源流关系，源流关系的文献之间未必存在直接的交流关系。阅读书目与一般书目不同，但可以和古典文献学一样能够解释语词的意义，不过注出的不是源流关系，而是交流关系。阅读书目包含了交流信息，校注文本的语词与阅读书目的用例之间应当存在交流关系，诗人应当从阅读书目中获取了语词用例与信息。这表明法国学派的线性关系与比较文学文献学的线性关系不同，一个注出的是源流线性关系，一个注出的是交流线性关系。这是对谈，不宜讨论过细的东西，但只谈我自己的想法，就难以了解具体实践的状况，所以还是得讨论细节的问题。

王升远（《日语学习与研究》编辑部）：

我们都知道，中国本国就有着深厚的文献学传统。“中国古典文献学”已有一套综合运用版本、校勘、目录、注释、考证、辨伪、辑佚、编纂、检索等方面的、成熟的理论与方法。事实上，欧洲的古典学也有不在我们之下的经验主义传统。如此说来，能否请您结合自己的学术实践谈一谈，能够解决以传统的古典文献学所解决不了的问题？

张哲俊（四川大学）：

这个问题还是得举例来讨论，否则太抽象，难以理解。现在可以用不同方法来注释五山诗人瑞溪周凤的一首诗歌，看看会出现怎样不同的结果。

画　梅　图上木王元章《梅先生传》[5]

北人遮莫不知梅，九里千株手自栽。

明主龙飞南国化，欢颜花亦放春开。

图上木，疑木字为抄字之误，或为图上抄，图上抄录了王冕的《梅先生传》的一段文字。题注记载的《梅先生传》是王冕的作品，这是最为直白明确的信号，可以直接锁定《画梅》与《梅先生传》或王冕别集的文学关系。这是法国学派描述的线性关系，也就是两点一线，《画梅》是一点，另一点是《梅先生传》或王冕的《竹斋集》，这样两点一线之间产生了文学关系。顺着这条线索调查，确实能查到相关的信息，证明锁定这一线性关系是正确的。《梅先生传》是王冕所作，见于他的别集《竹斋集续集》：“先生名华，字魁，不知何许人，或谓出炎帝，其先有以滋味干商高宗，乃召与语，大悦曰：‘若作和羹，尔为盐梅。’因命食采于梅，赐以为氏。梅之有姓，自此始。……太史公曰：梅先生，翩翩浊世之高士也。观其清标雅韵，有古君子之风焉。彼华腴绮丽，乌能辱之哉！以故天下人士景爱慕仰，岂虚也耶！”[6]《梅先生传》与王冕的《竹斋集续集》应当是交流对象，与瑞溪周凤的《画梅》形成了一对一的线性关系。

在瑞溪的《画梅》中还有一条信息，就是王冕在九里山种梅。这一信息也见于《竹斋集•九里山中》卷上：“其一：荒苔丛篠路萦回，绕涧新栽百树梅。花落不随流水去，鹤飞常带白云来。”“其二：九里先生两鬓皤，今年贫胜去年多。敝衣无絮愁风劲，破屋牵萝奈雨何。”“其三：九里溪头晚雨晴，松风瑟瑟水泠泠。绝无过客问奇字，只有闲云到野亭”（王冕，2011：50-51）。《竹斋集•丁酉岁元日》卷中：“九里山中授时无，历日献岁喜天晴。道路何艰阻，山林似太平。梅香清海国，柳色上江城。且喜兰台近，疲民稍慰情。”[7]九里山确为王冕种梅的地方，学界对九里山有三说：一是江苏铜山县北的九里山；二是会稽（今浙江绍兴）九里山；三是浙江诸

暨县境内枫桥区的九里山，九里山又名煮石山，王冕号“煮石山农”。瑞溪未必知道九里山的所有信息，但王冕在九里山种梅是事实，说明瑞溪诗歌写的九里山种梅是正确的，这同时也可以证明瑞溪诗歌的内容信息，应当是来自王冕的《竹斋集》，这样就可以把《竹斋集》确定为阅读书目。王冕是元末明初的诗人，生存年代早于瑞溪周凤，因而《竹斋集》应当传入了日本。

但如果细心阅读，就一定会发现细节的差异，《竹斋集》写的是“新栽百树梅”，瑞溪写的是“九里千株”，“百树”与“千株”是不同的。这一差异究竟意味着什么？瑞溪的《画梅》与王冕的《竹斋集》之间有没有文学关系，或者这是文学关系的变异？首先可以确定《画梅》与《竹斋集》之间一定存在文学关系，王冕与瑞溪的《画梅》都写了九里山种梅之事。瑞溪周凤应当从《竹斋集》获取了王冕种梅的信息，这是完全可以相信的结论，因为瑞溪诗歌与《竹斋集》的信息几乎完全吻合。“百树”与“千株”的差异也是事实，不过，这只是细枝末节的问题，不足以改变《画梅》与《竹斋集》的文学关系，似乎完全可以不理会这一细节。把这一差异说成“变异”似乎也没有问题，“变异”是文学关系中的常见现象，我们也很容易理解《画梅》与《竹斋集》之间的变异问题。变异或产生于瑞溪的想象或夸张，但也可能出于瑞溪周凤的粗心大意，或者记忆失误。如果是失误，那么可以根据《竹斋集》校勘。《竹斋集》是典源，可以以典源为据校勘，“千株”当校勘为“百树”。瑞溪写的是王冕种梅，以《竹斋集》校勘应当不误。

不过，“百树”与“千株”的差异还存在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百树”与“千株”的差异不是什么“变异”，而是别有文献来源。如果以阅读书目注释，会发现《竹斋集》《竹斋集续集》不是阅读书目，《梅先生传》也不见于阅读书目的类书与总集、选集，这就有理由怀疑《画梅》的各种信息并不是来自《竹斋集》，这样就没有什么瑞溪的想象、夸张或失误，也就可能没有什么“变异”。有趣的是，阅读书目能够提供《画梅》王冕种梅千株的信息。瑞溪阅读书目中包含了明宋濂的《文宪集》卷十的《王冕传》。其中有云，“（王冕）乃携妻孥隐于九里山，种荁顷亩，粟倍之。种梅花千树，桃、杏居其半。芋一区，薤、韭各百本。引水为池，种鱼千余。头结茅庐三间，自题为梅花屋”[8]。此传记载王冕在九里山种千株梅树，与“九里千株手自栽”的诗句完全相合。瑞溪“明主龙飞南国化”一句，是指明太祖登基为君王，王冕归附明太祖。《王冕传》也有记载：“未几，汝颍兵起，一一如冕言。皇帝取婺州，将攻越，物色得冕，寘幕府，授以谘议参军”（宋濂，1986：552）。阅读书目的用例只有一个，就是宋濂的《王冕传》，典据用例与典据书目、篇目同在一条线上。《文宪集•王冕传》为线性关系的一点，瑞溪周凤《卧云藁•画梅》为线性关系的另一点，形成了两点一线的线性关系。瑞溪诗歌的信息只能来自《文宪集•王冕传》，此外没有其他的可能性，这就等于锁定了交流关系。在这条线上所有的信息完全吻合，只有“千株”，没有“百树”；没有差异，也没有“变异”。注为《竹斋集》是按照古典文献学或法国学派的方式注释的，注为《王冕传》是按照比较文学文献学的方法注释的，两种方法都注出“两点一线”的线性关系，但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点一线。不同的方法得出不同的线性关系，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看法，这没有什么奇怪，在人文学科的研究中这种情况常见不鲜。

王升远（《日语学习与研究》编辑部）：

这里或许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推敲的问题。首先，可否认为确定《竹斋集》为影响关系，只是低水平的、浅尝辄止的影响研究才会如此，这是否是古典文献学研究方法运用不当的结果？其次，是真有学者认为“千株”的信息来自于宋濂的《王冕传》吗，否则是我们造了一个稻草人再去打它的感觉。再次，前文考证出《文

宪集•王冕传》才是正确的影响源，而非《竹斋集》，这似乎只是通过实证的方式否认了一种可能，但似乎没有否定二者之间的“影响关系”。“事实上”的影响关系，不也是文学影响关系、源流关系的一种吗？

张哲俊（四川大学）：

你很敏锐，提出了好问题。第一个问题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方法问题，二是个人水平的问题。个人水平不高，自然会出现将《竹斋集》认定为瑞溪诗歌的直接依据。但从方法上看，这不是水平问题，按照古典文献学的方法，注释最好使用典源文献，《竹斋集》正是典源文献，这应当是好的注释。但从交流关系来看，这并不是好的注释，《竹斋集》是典源，但不是交流对象。第二个问题的实质还是有无比较文学文献学之实的问题。如果前人已经根据阅读书目认为千株的信息来自宋濂的《王冕传》，那么表明比较文学文献学已经存在了，只是没有使用比较文学文献学的名称而已。但事实是此前没有比较文学文献学，也没有人根据阅读书目认为信息来自《王冕传》。如果确实有人认为信息来自《王冕传》，但没有确定《王冕传》为阅读书目，那么信息的直接来源注为《王冕传》，就不是好的注释与研究，这种情况下应当使用典源《竹斋集》。其实比较文学文献学的目的不是解释前人的研究，解释固然也有价值，但更重要的是方法问题。前人有无注为《王冕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进入到不同前人的方法、路径，有没有能够开拓新的方法，才是问题的关键。你提的这个问题中，还包含了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以阅读书目校注的有效性问题，以阅读书目校注能否确实注出交流关系的事实，仅据千株的用例不免会产生怀疑，但我以这种方法注释瑞溪周凤《卧云藁》的结果表明，几乎所有的典据都能够找到阅读书目的用例，也就是说以阅读书目校注是还原交流关系的高效方法，应当高度重视阅读书目提供的语词、信息的用例。

第三个问题更为重要，这个问题在前面已经谈到，现在需要更细地讨论。《王冕传》与瑞溪《画梅》的文学关系是交流关系，但并没有因此就否定《竹斋集》与瑞溪《画梅》的文学关系。《竹斋集》与《画梅》之间的影响关系是无法否定的，但并不表明瑞溪《画梅》的信息只能来自《竹斋集》，也就是说《画梅》的信息即使不是来自《竹斋集》，也可以存在影响关系，也就是存在源流关系。但是《画梅》与《王冕传》关系不是这种源流关系，而是交流关系，《王冕传》出于阅读书目，是交流对象，即王冕种梅信息的直接来源。那么能否将交流关系并入源流关系呢？显然不能：一是因为法国学派或古典文献学没有以阅读书目校注交流关系；二是源流关系与交流关系的性质不同；三是现在需要的是区别源流关系与交流关系，不是混同两种关系，混同只能产生无穷无尽、难以解决的困境。源流关系与交流关系的差异是建立在阅读书目与一般书目、典源与典据的不同，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典源、典据、出典、用典、用事等等用语没有多大的不同。建构比较文学文献学，需要使用典源与典据的用语，也需要重新定义。典源可以定义为最初出现用例的文献，典据是语词用例的直接来源，均为阅读书目的用例。典源与典据的性质完全不同，与典源联系在一起的是源流关系，与典据联系在一起的是交流关系。典源可以同时也是典据，但这取决于是否出自阅读书目，出自阅读书目，那么典源也是典据，源流关系与交流关系重合，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没有限定使用阅读书目，没有区别阅读书目与一般书目，自然也不会区别典源与典据的不同，必然会混同源流关系与交流关系。法国学派的影响关系是一种宽泛的文学关系，源流关系也是宽泛的文学关系，影响关系基本等同于源流关系。古典文献学也没有限定使用阅读书目校注，同样也难以区别源流关系与交流关系。区别源流关系与交流关系的依据是交流对象与非交流对象，出现于阅读书目，就是交流对象；没有出现于阅读书目，就不是交流对象。如果没有出于阅读书目，就没有机会成为交流对象，对于交流关系来说，典据是不可缺少的因素，典源则不

是，典据是交流关系的直接体现。

前阅读书目的阶段没有区别源流关系与交流关系，两种关系严重纠缠，分不清哪一个是源流关系，哪一个是交流关系，也就会出现真假变异的问题。引入阅读书目之后，纷乱复杂的文学关系变得可以清晰描述，可以认识到不是所有的差异都是变异，有真正的变异，也有虚假的变异。真假变异的本质问题，其实还是文献问题，找到最重要而又准确的文献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以阅读书目注释与研究是找到这种文献的捷径，这是建构比较文学文献学的意义所在，不仅能够区别源流关系与交流关系的差异，也能够清清楚楚地了解到真假变异，能够修正错误。建构比较文学文献学的主要价值是能够提高注释交流关系的准确性与可靠度，如果不能提供更为准确的结果，比较文学文献学也就丧失了存在的意义。没有阅读书目，也可退回到源流关系的研究，但源流关系的变异只是源流关系的变异，不能认为是交流关系的变异，是否存在交流关系是未知数。源流关系与交流关系都存在线性关系，但这是不同的两种线性关系，有时可以巧合，巧合加重了两种线性关系的纠缠，但并不表明可以混同两种线性关系。

就以百树与千株的用例来看，《竹斎集》是典源，但不是阅读书目，也就不是交流对象，只有源流关系，没有交流关系。《王冕传》是阅读书目，千株就是典据，是交流对象，也就出现了交流关系。从源流关系来看存在变异，从交流关系来看没有变异，那么哪一种是正确的，或者是没有正确与错误，只有不同角度的不同看法？显然不能这样认识，因为百树与千株的正确或错误十分明显。这里的确存在不同角度的问题，但源流关系是比较宽松的文学关系，其中存在正确的结果，也有不少错误的结果，正误混杂在一起。在源流关系的范围内，难以了解正确与错误。交流关系的研究是比较准确的研究方法，引入阅读书目大大地提高了准确性，能够明显地看到正确与错误，可以研究出究竟是否存在变异。在源流关系的层面上，经常会编造出虚假的变异。但这不是说没有变异，变异是存在的，即使是调查了所有的阅读书目，也不存在信息的直接来源，就说明存在变异，应当是真正的变异。

王升远（《日语学习与研究》编辑部）：

那么，源流线性关系与交流线性关系之外，比较文学文献学与古典文献学还有什么重要的差异？

张哲俊（四川大学）：

以阅读书目注释交流关系，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除了新的线性关系之外，还有多点多线的网状关系。阅读书目的用例只有一个，那就只能形成线性关系。但是更多见的情况是，出现复数的阅读书目用例，这就与只有一个用例就不同了。这样就会出现新的问题，复数的阅读书目用例是多个线性关系的叠加，还是出现了完全不同的交流形态？如果是线性关系的叠加，就表明没有出现新的交流形态。但如果不是线性关系的叠加，那么又是如何交流的？交流总是存在交流对象，可以存在一个交流对象，也可以存在多个交流对象，也就会形成交流对象的范围，交流对象的范围就是网状关系，网状关系中存在多个阅读书目及其用例，这样出现了多个交流对象，也就存在多点。每个点与注释对象的文本语词都存在关系，这样就出现了多线，多点多线也就会形成网状关系。但网状关系与线性关系的最大不同是虚实关系，线性关系中没有虚实关系，只有事实关系，语词用例与信息只能通过唯一的线交流，因而只能是事实关系。但网状关系的每一条线未必都是交流实线，有可能是虚线，也就无法锁定线性关系，无法锁定典据。但存在交流对象的范围，也

就是典据范围，典据范围实际就是网状关系，网状关系的边界是可以描述的。描述的方式就是记录典据范围的阅读书目及其用例，交流关系就存在于这一边界以内，但不确定交流关系是在哪几条线上产生的。典据与典据范围不同，典据是锁定的阅读书目及其用例，典据范围的阅读书目及其用例永远是疑似典据，典据范围的关系也就只能是模糊关系。线性关系与网状关系的性质是不同的，交流形态也是完全不同的，网状关系不是线性关系的叠加。下面是瑞溪周凤的诗歌，注释诗歌中的西子颜，就可以看到网状关系的一种形态。

《湖山晴雨图》
晴好雨奇朝暮间，天公多事动湖山。
可怜斋物东坡老，犹比恼人西子颜。　　（瑞溪周鳳，1971：567）

所谓“西子颜”，指的是西湖美景，这一定是来自苏轼的诗歌，可以以诗中的“东坡老”语词为证。典据篇目为《东坡诗集注·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卷十七：“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9]。这首诗歌还见于《东坡全集》卷四、《施注苏诗》卷六，这些书目都是阅读书目，那么瑞溪周凤是从哪一本阅读书目中获取语词用例与信息呢？三本苏轼别集提供了等量信息，因而无法确定瑞溪是从哪一本苏轼别集获取西子颜的语词与信息。其实除了三本苏轼别集之外，还有《诗话总龟》卷十六、《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五、《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十七等亦载全诗或诗句，王十朋《梅溪后集》卷十七、《江湖小集》卷十五也有用例。这些书目都是阅读书目，是语词与信息的来源范围。这些诗话与类书的使用频率也相当高，其重要性未必低于苏轼的三本别集。在这些书目中同样无法锁定语词、信息的来源，这种状况已经与线性关系完全不同了，这是典据书目的范围。一旦能够锁定信息来源，那么典据范围也就会消失，但问题是无法锁定。其实也没有必要勉强锁定，潜移默化也是记忆的常见方式，诗人在最初接触苏轼诗歌之后，在以后的阅读中不断地碰到、并记住了苏轼诗歌，也是完全可能的。在没有引入阅读书目之前，只能说是潜移默化，此外好像也做不了什么，这也是潜移默化特别神秘的原因。但引入阅读书目之后，可以描述潜移默化的范围，据此可以描述典据书目的范围，其实也就是可以描述交流关系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每一阅读书目都与瑞溪诗歌存在关系，可能是产生了交流关系，也可能没有产生交流关系，但可以确定在这一范围内一定是产生了交流关系。

苏轼诗歌是交流关系的一条线，这里存在网状关系。但是“西子颜”还有一条线，就是其用例线索。“西子颜”的用例并不见于苏轼诗歌，实则见于《文选》卷五十五的陆机《演连珠》：“是以众听所倾，非假北里之操；万夫婉娈，非俟西子之颜”[10]。《文选》是阅读书目，瑞溪诗歌的“西子颜”用例，显然来自陆机的“西子之颜”。苏轼的“西子”，或陆机的“西子之颜”，都是指西施，但陆机的“西子之颜”与湖水无关。从交流关系来看，这是另外一条线。“西子之颜”的用例只见于《文选》，因而这是一条线性关系。这样，瑞溪诗歌的“西子颜”就有了两条线：一条是苏轼诗歌的线，一条是陆机诗歌的线。两者交汇于瑞溪诗歌中的“西子颜”，这是网状关系的一部分。

以一般书目注释，无法认识到典据范围或网状关系。除了上面说的八种书目之外，还有《梦粱录》卷十二、《西湖游览志余》卷十等数十种书目也有用例。但这些书目不是阅读书目，如果没有引入阅读书目，就无法知道上面八种用例与一般书目的边界在哪里，不知道这一边界，也就不知道典据范围、网状关系的边界。实际上，一般书目没有典据范围、网状关系，也就不存在边界问题。若不知道边界，就会出现其他问题，在数

十种书目用例中，不知道哪个存在交流关系，也不知道哪个没有交流关系，连交流关系的范围都找不到。其结果只能是根据需要认为哪一书目存在交流关系，但那只能是在编造交流关系，事实上，先行研究中太多的交流关系是臆想、编造出来的。

王升远（《日语学习与研究》编辑部）：

那么，描述上面所提到的多种交流关系有什么意义呢？

张哲俊（四川大学）：

我在《从日藏汉籍书目到比较文学文献学》（张哲俊，2024：1）这篇文章中提到了线性关系、网状关系与常见关系，但没有提及三种交流关系的意义问题。发现不同交流关系的意义，与其说是存在实用意义，不如说是认知意义，或者认知价值更高。“比较文学文献学”意义上的线性关系与网状关系的数量悬殊，按照文学关系研究史的描述，线性关系应当是全部文学关系，但校注《卧云藁》的结果表明，网状关系的数量是线性关系的三倍，这就颠覆了线性关系的绝对地位。当然这样比较数据，似乎没有意义，因为比较文学文献学的新线性关系不等于法国学派描述的旧线性关系，应当比较旧线性关系与网状关系的数据，这样才能说明网状关系颠覆了旧线性关系。但问题是即使统计了旧线性关系的数据也没有意义，因为旧统线性关系有不少的错误，很多线性关系实际上是网状关系或常见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完全不需要统计旧线性关系的数据。但是“比较文学文献学”的线性关系是比较可靠的，这种新线性关系与旧线性关系的特征基本类似，因而比较新线性关系与网状关系的数据更有意义，也更能说明交流关系的事实状态。比较数据的结果表明，线性关系的确存在，但绝对不是唯一的文学关系。旧线性关系应当是全部的文学关系，但实际上连唯一的线性关系都不是，线性关系存在两种，这已经颠覆了以往的认知。如果还存在网状关系、常见关系，就更是颠覆了文学关系的认知。旧线性关系不是唯一，其实是唯三、唯四之一，甚至都不是交流关系的基本形态。

最后，我想强调，东亚文化圈的交流关系极其密集，交流形态也丰富多样，东亚学者对交流关系的研究应当有更多的贡献，但实际上并没有，一直都是按照法国学派的方式研究的。法国学派的研究方式固然是经典方式，不能抛弃，但也应当发掘出更多的研究方式，这样才能接近交流关系不同形态的事实。如果只有一种交流形态，只用一种研究方式没有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现在的文学关系研究现状，就是只有一种研究文学关系的方式，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改变这种现状是可能的，但首先应当改变认知，否则无法全面推进交流关系的研究。

王升远（《日语学习与研究》编辑部）：

感谢张老师的详尽阐述，相信《日语学习与研究》杂志的读者会因此而对“比较文学文献学”的精髓有更深入的领悟。“比较文学文献学”的提出也为从事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们提示了一个立足于本国学术传统又兼收域外学术之长、立足于学术研究实践并在此基础之上提炼理论表述的范例。

注

[1] 张哲俊.寿星形象的流变与校勘、注释的纠缠——比较文学文献学示例[J].外国文学评论，2023(2)；张哲俊.比较文学文献学——从潜在书目的网状关系再探文学交流关系研究[J].外国文学评论，2024(4)；张哲俊.比较文学文献学——五山文学唐风地名的来源与使用[J].广东社会科学，2024(5)；张哲俊.从日藏汉籍书目到比较文学文献学[J].中国比较文学，2024(1).

[2] A·E·豪斯曼.用思考校勘[M]//苏杰,编译.西方校勘学论著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6.
[3] 芳賀矢一.日本文献学[M].東京:富山房,1928:11.
[4] 唐德刚,整理,翻译.胡适口述自传[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135.
[5] 瑞溪周鳳.卧雲藁[M]//玉村竹二,校注.五山文學新集:第五卷.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1:573.
[6] 王冕.竹斋诗续集[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274-276.
[7] 王冕.竹斋集:丁酉岁元日卷中[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33.
[8] 宋濂.文宪集:王冕传卷十[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552.
[9] 王十朋.东坡诗集注卷十七[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338.
[10] 萧统,编.文選卷第五十五第六冊[M].唐李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392.

作者简介:张哲俊　男　朝鲜族　四川大学教授　研究方向:东亚比较文学研究
联系方式:E-mail:zhejun816@hotmail.com
作者简介:王升远　男　满族　《日语学习与研究》杂志常务副总编辑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文学研究、中日比较文学研究
联系方式:wangshengyuan@fudan.edu.cn

Wha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hilology" is and What it is for: Theoretical Dialogue Based on the Research Practice of Sino-Japanese Literary Relations

Abstrac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hilology is a new field and method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to date, no name or method fo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hilology has been found in the field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esearch. Comparative literary philology is a method of annotating and studying literary communication relationships through the use of reading lists. Due to the introduction of reading lists, reading lists contain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which can explain the meaning of words and provide communication relationships at the same time. The task of comparative literary philology is to annotate and restore communication relationship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ommunication relationships and source relationships come from references and sources. The focus of source relationship research is to investigate the inheritance and variation of successive literature, but the focus of communication relationship research is to investigate communication objects or the scope of communication objects.

Keyword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hilology; communication relationships; source relationships; linear relationship; network relationship

Authors' Information:
Zhang Zhejun (Male)
Professor at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mail: zhejun816@hotmail.com

Wang Shengyuan (Male)
Professor at Fudan University, China
Japanese Literature
E-mail: wangshengyuan@fudan.edu.cn

(责任编辑:李广悦)